

本期专题·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

- 02 聚焦协同行动 推动共同发展
- 03 《亚洲竞争力 2019 年度报告》
- 04 博鳌论坛七大热词
- 06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
- 08 博鳌论坛 2019 年年会发布四大学术报告
- 09 中国综合竞争力分析

全球大观

- 10 知己知彼：世界大变局中的未来中国

经济纵横

- 15 个人破产制度真要来了吗？

文化漫步

- 17 汪涌豪：拿什么来拯救被边缘化的经典阅读？

悦读时光

- 封三 清明祭：桃李不言笑，遥寄一枝春

编者按：3月26日—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主题是“共同命运 共同行动 共同发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代表参加今年年会，其中外国政要14名，部长级官员140多名。近百位世界五百强和知名企业高管，上千名企业家，以及众多专家学者。来自35个国家、地区186家媒体的1400多名记者参加今年的年会。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设置了五大板块议题：一是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板块，诊断当前世界经济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针对全球化面临的挑战提出解决的方案；二是多边主义区域合作跟全球治理，探讨多边主义与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三是创新驱动板块，讨论新一轮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的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寻找最佳路径；四是高质量发展板块，围绕经济各领域的重点问题，探讨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行业方向；五是一些热点前沿问题，包括政治、外交、安全、健康、教育、民生等议题。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国际经贸摩擦有所缓解，但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仍有市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冲击。世界上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热点问题不时升温，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突出。面对当前世界存在的重大问题，博鳌亚洲论坛愿意为各方提供一个高端的对话平台，为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共同发展凝聚更多共识，推动更多行动。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凝聚广泛共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高端对话平台。博鳌亚洲论坛创办于2001年。18年来，飞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博鳌论坛也从纯经济论坛转变为综合性高端对话平台，成为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开放、包容、对话、合作的重要世界舞台。近年来，博鳌论坛影响力不断提升，更具世界气质。面对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博鳌论坛以全球化视野审视亚洲发展进程，重点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的战略对接，为打造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本期推出“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专题，紧紧围绕本次论坛普遍关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议题，例如：5G物联、人工智能、共享经济、WTO面临的挑战与改革等全球化议题，选取相关文章，提供有针对性的观点和思考，希望对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聚焦协同行动 推动共同发展

3月26日-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主题是“共同命运 协同行动 共同发展”。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凝聚广泛共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高端对话平台。



凝聚共识，扩大“朋友圈”

作为中国今年首个重要主场外交活动，博鳌论坛年会吸引了6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嘉宾，其中有韩国总理李洛渊、老挝总理通伦、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多位外国前政要，包括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等；50多位国外部长级官员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180多名企业领袖参加论坛。除了亚洲国家，博鳌论坛不断扩大“朋友圈”，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巴西、塞尔维亚等国政府、企业代表参与论坛活动。各方代表相聚在风景如画的博鳌小镇，围绕世界、区域治理以及创新驱动等话题，交流经验、贡献智慧、凝聚共识。

博鳌亚洲论坛“请进来”的同时，也“走出去”，打造开放性平台。2004年，论坛首次在境外举办国际会议——德黑兰能源论坛。之后在孟买、迪拜、阿斯塔纳、曼谷、首尔等多个亚洲国家城市举办专题会议，邀请多国企业家到会议举办国参访，切实推动双边多边经贸往来。此外，博鳌论坛在西雅图（2014年）、伦敦（2015年）、墨尔本（2016年）、巴黎（2017年）、罗马（2018年）等西方国家城市举行国际会议，在全球化背景下，增进欧亚之间互信、合作与战略对接。

博鳌亚洲论坛拓展与其它国家论坛间合作，加强联动，实现资源共享。2015年，论坛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签署合作备忘录，在圣彼得堡论坛框架下共同举办中国主题会议。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起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合作，在其框架下共同探讨“一

带一路”建设与战略对接。

议题丰富，持续提升影响力

博鳌亚洲论坛创办于2001年。18年来，飞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博鳌论坛也从纯经济论坛转变为综合性高端对话平台，成为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开放、包容、对话、合作的重要世界舞台。

从论坛历届年会主题来看，开始时聚焦亚洲区域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包容性发展，自2011年始每年发布《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新兴经济体报告》《亚洲竞争力报告》。今年将首次推出《亚洲金融发展报告》，重点总结亚洲区域基础设施融资领域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实践。四大重磅学术报告旨在向世界讲述亚洲的现状与未来。博鳌论坛立足亚洲区域一体化与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初衷由此可见一斑。

近年来，博鳌论坛影响力不断提升，更具世界气质。面对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博鳌论坛以全球化视野审视亚洲发展进程，重点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的战略对接，为打造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今年博鳌论坛的主题是“共同命运 协同行动 共同发展”，下设五大版块：“开放型世界经济”、“多边主义、区域合作、全球治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热点前沿”版块。围绕年会主题，设立分论坛、CEO对话、圆桌会议等60多场活动。在丰富的议题设置中，除了探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亚洲区域创新发展的话题外，还关注5G物联、人工智能、共享经济、WTO面临的挑战与改革等全球化议题，为全球治理提供智慧与方案。

(2018-3-30 国际在线)

《亚洲竞争力 2019 年度报告》

亚洲，48 个国家，51 个经济体，对全球增长贡献率 60% 以上。受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因素影响，亚洲各经济体的竞争排位出现了变化。

3 月 26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的《亚洲竞争力 2019 年度报告》（下称，《报告》）显示，韩国拔得头筹，排名较此前跃升两位；中国台湾居第二位；新加坡第三，交出了此前第一的“宝座”；中国香港排名第四。

此外，全球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中国，在亚洲经济体中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九，连续 5 年位次没有发生变化。日本，全球经济总量第三，亚洲综合竞争力第五。



图 2.1 亚洲经济体 2018 年度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名

中国差在科研创新

与唯 GDP 论的经济总量排名不同，亚洲综合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成更全面，包括 5 个一级指标：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整体经济活力、社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

其中，每个一类指标下面又包括多个二类指标和初始指标。以基础设施状况为例，可以细化到，国际航班

里程数、个人电脑普及率、百人移动电话拥有量等。

不得不说的是减分项

具体来看，中国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九，细化指标有加分项，也有减分项。

加分项，整体经济活力。在亚洲经济体 2018 年度整体经济活力排名中，中国以 67.31 位列第一。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迈上 90 万亿元新台阶，GDP 增速 6.6% 完成预期发展目标。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对世界 GDP 总量的贡献仍然较高。

加分项，商业行政效率。去年，世界银行发布《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把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一次性提升 32 位，从上期的第 78 位跃升至第 46 位，进入全球排名前 50。今年以来，中国继续推进行政权力下放和审批制度改革，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加分项，基础设施状况。《报告》显示，中国因交通网络密度提升、互联网宽带提速等设施改善，基础设施状况排位第 12，较 2017 年上升 2 位。如今，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一，达到 29000 公里。全国已有 30 多座城市开通了地铁，每年运送乘客达数十亿人次。

《报告》显示，中国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相比 2017 年度下降了 1 位，不及新西兰、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这表明，相比其他经济体，中国在教育、科研、创新等方面仍需继续加大投入。从过去 5 年的竞争力排名看，中国位次没有变化，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四小龙表现依然抢眼

综合榜单看，“亚洲四小龙”竞争力依然抢眼，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综合竞争力在评估的 37 个经济体中位居前 4 位，具有领先亚洲的国际竞争优势。韩国跃居榜首，与其在各个维度较为稳定和相对均衡的表现息息相关。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韩国有较大进步，相比上年提升了 5 位。在基础设施方面，韩国排在第五，仅次于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阿联酋。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 and 科研投入方面，韩国保持前列。在人力资本与创新维度上，韩国表现位列第一，超过中国台湾。据韩

博鳌论坛七大热词

对外开放、外商投资法、人工智能……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期间，热词频现。

对外开放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要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创新，他宣布了一系列细化措施，再度释放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信号。

在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看来，中国的开放正在由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是一个全球潮流。

外商投资法

随着外商投资法的出台、配套法规的制定，不少与会外商坚定了来华投资的信心。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 CEO 戴璞表示，众多外国企业对外商投资法的

通过表示赞赏，同时也期待看到其实施与执行。

阿斯利康董事长雷夫·约翰森直言：“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将有利于中国营造更为公开、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创新的主动性，有助于吸引并汇聚海外资源，进一步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经济相互融合，实现共同发展。”

人工智能

“我们对 AI（人工智能）的需求非常强烈。”携程旅行网首席传播官席伟航说，携程过去最多有 15000 个人工客服，客服成本非常高。两三年以前，携程开始引入人工智能工具，今后可能有 70%-80% 的呼叫电话可用人工智能来分担。

威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文琦表示，未来人工智能将会应用于各行各业，到 2030 年，全球可能有 8

表 2.2 亚洲经济体 2013—2018 年度综合竞争力排名表

经济体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韩国	1	+2	3	0	3	0	3	0	3	-1	2	+2
中国台湾	2	+2	4	0	4	0	4	0	4	0	4	-1
新加坡	3	-2	1	0	1	0	1	0	1	0	1	+1
中国香港	4	-2	2	0	2	0	2	0	2	+1	3	-2
日本	5	+2	7	1	8	-1	7	0	7	0	7	+2
以色列	6	0	6	1	7	+1	8	0	8	0	8	+3
澳大利亚	7	-2	5	0	5	0	5	0	5	+1	6	-1
新西兰	8	0	8	-2	6	0	6	0	6	-1	5	+3
中国	9	0	9	0	9	0	9	0	9	0	9	+1
阿联酋	10	+2	12	+2	14	+2	16	0	16	-1	15	-9
马来西亚	11	+2	13	0	13	+2	15	-4	11	0	11	+5
格鲁吉亚	12	+3	15	+2	17	+1	18	-1	17	+1	18	+2
哈萨克斯坦	13	+1	14	-2	12	0	12	0	12	0	12	+3
巴林	14	-4	10	+1	11	-1	10	0	10	0	10	-3
科威特	15	+1	16	0	16	-3	13	0	13	0	13	0
沙特阿拉伯	16	+1	17	-2	15	-1	14	+1	15	+1	16	-2
泰国	17	+2	19	+2	21	-2	19	0	19	0	19	0
卡塔尔	18	-7	11	-1	10	+1	11	+3	14	0	14	-2
阿曼	19	-1	18	0	18	-1	17	+1	18	-1	17	0
阿塞拜疆	20	+3	23	-3	20	+1	21	0	21	0	21	+1

国统计厅数据，2018 年韩国人均 GDP 达到 31370 美元，

人均 GNI（国民总收入）达到 31349 美元，首次突破 3 万美元大关。

韩国之外，中国台湾在营造更好商业环境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商业行政效率相比 2017 年上升了 5 位，助力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对外贸易仍然是新加坡的重要支柱，出口的良好表现促使其竞争力维持前位。中国香港人口密度大，但基础设施状况十分发达，位居第一位。相比“亚洲四小龙”，传统发达经济体竞争力稍逊，日本、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竞争力排名稳坐 5-8 位，各项经济指标排名总体居前，但整体经济活力相对靠后，低于其他指标的平均排名水平。

《报告》进一步指出，随着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亚洲经济体的进一步融合，未来亚洲经济形势将在自立的基础上稳步前行，并依托巨大消费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有望在全球率先走出经济增长低谷。

（2019-3-26 国是直通车）

亿个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要加强三地优势互补，并着力解决传统制造业转型的难题。

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建言，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人才政策是重中之重，“一定要实行更有竞争力、吸引力的人才政策”。

5G 技术

“5G 最关键的是开放合作，全球统一标准。”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称，5G 应用最广泛的是移动状

态的物联网，最大的市场可能是车联网。

小米集团董事长兼 CEO 雷军断言，5G 对各行各业都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明后年将迎来 5G 手机换机潮。韩国产业资源部部长成允模表示，5G 的关键词是融合，将 5G 和现有产业设施充分联合在一起非常重要。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截至 2018 年年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长期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巨大金融支持，为 600 多个项目提供 1900 多亿美元融资。

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祖布科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资源配置产生极大影响，“2019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的对接，并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向世界证明了一个真理：发展道路不只一条。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表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是不完整的，改革开放让全世界了解到中国人的优秀。

(2019-3-29 中国新闻网)

(上接第 14 页)

从这个角度看，持续改革开放已长达四十年的中国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三是三大冲突将主导未来五至十年的国际格局：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之间、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其中到底哪项冲突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是对未来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判断。

从目前局势来看，似乎中国与西方之间、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冲突，将必然地会成为明天世界最主要的矛盾。因为两者已经无法共生共存。至于中美较量，早在去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我就在《新民周刊》上撰文指出，中美之间五至十年内将会陷于激烈的冲突之中，只是这种冲突我们不知道是以“中国模式”发生，还是以“美国模式”发生。所谓“美国模式”就是战争。只是，当世界进入了核时代，美国其实从来没有对任何其他大国、特别是有可能在军事上

对美国进行反抗的核国家发动过战争。美国一向只对小国动手：朝鲜、越南、伊拉克……

而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一场长期的、除了战争手段以外的全方位的较量，无声的、但同样是激烈的较量。从贸易到地缘政治、从文化到软实力冲突……所谓全方位就是没有空白点的较量。要知道，美国虽然从来没有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但却成功地从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瓦解了这个超级大国。今天，美国实际上也正在发动一场对中国的精神殖民、一场无形的思想战争！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中，我们似乎正处于守势……

君不见，今天媚美、崇美、恐美之风始终在神州大地徘徊。问题在于，这场隐形冲突之结果将会是“中兴”模式还是“华为”模式，将决定中美两国未来的关系实质；也将决定中国在未来世界的位置。

(2019 年 12 期 新民周刊)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于 3 月 29 日落下帷幕。聚焦亚洲、放眼世界。4 天，50 多场活动，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智库学者，就当下国际政治经济热门话题深入探讨交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年会是在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际和地区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举行的，而对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坚定支持，是本届年会最重要的成果和最令人鼓舞的信息。



全球化：挑战与改革

“今年年会的主题和往年具有延续性，这是因为世界日益紧密相连，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应该共同行动，实现共同发展。”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表示，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亚洲，面向世界发出变革的声音。“一带一路”、WTO 改革、人工智能等主题的分论坛还没开始，等候的人们早已排起了长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第一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他表示，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议题设置都是世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做出了积极

贡献。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各方应该携手共同推动发展，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认为，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国家的贸易摩擦都不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问题，很多国家都会受影响，最终还是要靠多边机制。

沙姆沙德·阿赫塔尔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委会委员。她表示，互联互通等问题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发展，而“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有利于提高全球化的质量。

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祖布科夫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有助于重建一个新的经贸体系，优化全球资源配置。

亚洲：合作与对接

亚洲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据论坛发布的报告统计，2017—2018 年，17 个新自贸协定签署，约 70 个双边协定目前正处于谈判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等高水平协定明显提速，亚洲经济的自身依存度不断提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表示，面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亚洲各国必须继续做出努力。“根据我们的预计，如果取消所有的非关税壁垒，未来 10 年左右，亚洲经济受益幅度将相当于增加 10% 到 15% 的 GDP。”

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需要软件，也需要硬件。菲律宾众议长、前总统阿罗约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为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提供了硬件设施，已成为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成为与会代表共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董事长金立群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航路、公路、铁路之路，更是各国互联互通的愿望。

中国：开放与创新

今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外商投资法成为本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热议的焦点。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举措。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凯尔德表示，中国已经采取了许多开放举措，同时也在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目前看，中国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以电子支付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金融发展动力强劲，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快速度。

全球性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董事长雷夫·约翰森

非常看好中国创新发展。他表示，目前，中国在生物和化学领域的研究呈现积极态势，经济增长则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增长转型。更为开放的创新环境，使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也是非常重要的创新中心。

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与会代表有不同的视角，共同的是认为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经济的机遇挑战，与会代表有不同的解读，共同的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总结道，着眼长远、始终如一发展经济的意愿，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加入世界主流潮流、向世界开放的战略选择是中国成功的经验。“相信中国能够以崭新姿态迎接和应对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2019-3-30 人民日报)

(上接第 20 页)

过的经典中，你已学会了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获得了智慧和眼光，这是最重要的，不必死扣到底读了多少本。归结上述讲演，我想说，全球化时代使得世界范围内，阅读越来越边缘化，但是经典的魅力从来没有消退。所以各位一定要读好书，读经典，这样才能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修身莫若养性，至乐莫如读书”。

阿多诺曾经说“当今的世界充满着令人作呕的匆忙”，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就是充满着令人作呕的匆忙，包括吉朋所说的“群聚无伴”的孤独，尽管你手机朋友圈里的名单很长，但能讲心里话的人又有几个？而读书

正是一件能够让人克服孤独的事情，甚而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可以让人学会利用和品尝他的孤独。

杨绛老先生曾经说读书就像串门，你不需要预约，就可以敲开任何一个大师的门，这真是天下最好的事情。所以，不要为不读书找各种理由，但凡你能坐下来、打开书，你就一定会有所得。（作者：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9-4-10 上观新闻)



博鳌论坛 2019 年年会发布四大学术报告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于 3 月 26—29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记者 3 月 19 日从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获悉，年会期间，除了延续历年惯例发布《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新兴经济体发展》和《亚洲竞争力》三大学术报告外，今年还将推出《亚洲金融发展报告》，这也是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与亚洲三家国际机构合作的学术成果。据悉，这四份报告将在 2019 年年会首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对外发布。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自 2011 年开始推出年度学术报告，至今已近 10 年。2019 年的四份报告各具亮点。其中，《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9 年度报告》由对外经贸大学前副校长林桂军领衔。亚洲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大的背景下，能否持续推进一体化是该次报告关心的核心议题。报告在分析了区域贸易、投资、金融开放方面的数据后，对亚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此外，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规则和自贸区谈判也是研究团队重点关注的领域。

《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9 年度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担纲。与 2018 年度

的报告相比，本年度报告不仅结构更加清晰，体系更加完善，而且结合热点问题，对二十国集团中的 11 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状况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美联储加息等全球性热点议题都是报告的重点议题，写作团队还在短期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长期发展问题的深刻反思。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公共私人债务方面，都充分体现了报告的前瞻性。

《亚洲竞争力 2019 年度报告》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团队主笔。报告的最大亮点在于与时俱进地完善经济体竞争力指标，更准确地体现亚洲经济体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通过较为成熟的评价体系，直观反映亚洲经济体在十年中的进步和提升。报告认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洗礼的亚洲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大大提升，经济开放与合作保持动力。

《亚洲金融发展报告：基础设施融资篇》是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与其他国际机构合作撰写的旗舰报告。写作团队分别来自博鳌论坛研究院、东盟 10+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研究所和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更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专家组成指导小组为写作团队提供研究意见。报告分总览、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五个板块，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各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方面的机遇与挑战。报告还详细阐述了 7 个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合作案例，为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政策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份全英文写作的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标志着亚洲智力合作的新起点。

(2019-3-19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综合竞争力分析

3月26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会，发布了《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新兴经济体报告》《亚洲竞争力报告》和《亚洲金融发展报告》四大学术报告。



中国对亚洲各国出口贡献增加值最多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9年度报告》指出，贸易摩擦使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东南亚引进外资保持强劲势头；亚洲进口转向快速增长。2018年前8个月，亚洲绝大多数重要经济体进口均取得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并超过13.4%的全球平均增长率，其中进口增长最快的是印尼和中国。

《报告》认为，亚洲经济体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快速提升，中国对各国出口贡献的增加值最多。2017年，中国的增加值在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率居第一位，说明中国是亚洲制造业生产网络的中心。

中国综合竞争力仍居亚洲经济体第9位

《亚洲竞争力2019年度报告》报告研究团队分别从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整体经济活力、社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五个方面剖析了各经济体的具体表现、优劣所在和动态演变。9年来，亚洲各经济体已开始初步享受到巨大的一体化红利，亚洲经济的成长和亚洲竞争力的提升，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

势，各经济体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韧性不断提高，彼此之间的竞争力差距有缩窄迹象。

《报告》显示，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综合竞争力居前4位，具有领先亚洲的国际竞争优势。日本、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阿联酋分列第5位至第10位。中国仍保持上年度第9位的排名，竞争地位稳固，商业行政效率和社会发展水平进步最大。

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数额创历史新高

《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指出，2018年，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新兴11国”（E11）经济增长率略微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数据加权计算，2018年E1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5.1%，略低于上年5.2%的增长率。

《报告》显示，2018年E11多数国家就业形势好转，收入水平呈改善势头，但物价有所上升，通胀压力加大。同时，贸易增长动力显著增强，外商直接投资逆势增长。例如，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3%，创历史新高。

《报告》认为，2019年，E11总体经济增速大幅波动的可能性较小，但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考虑到各国将加强运用政策手段应对经济下行风险，2019年E11各国经济增速与2018年基本持平的可能性较大。

亚洲需要智能、绿色、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

本次年会首次发布《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深入分析亚洲金融发展现状并形成政策建议。《报告》指出，亚洲地区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60%，但亚洲的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需要进一步发展，以便活用各地区的超额储蓄，用于满足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智能、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现在的亚洲所需要的。

(2019-3-26 南海网)

知己知彼：世界大变局中的未来中国

此文见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结束其对欧洲三国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的国事访问。这是进入2019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的首次出访。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马克龙夫人布丽吉特参加。



其含义耐人寻味：一方面，目前由极右翼执政的意大利和法国正在发生西方内部盟国之间最大的外交分歧，法国甚至一度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双方正处于二战以来关系最紧张的局面；中国国家元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敏感的时期同时访问两国，难免令人产生一些联想……

另一方面，意法两国在对华外交策略方面也呈现了相当大的不同：意大利已经明确加入“一带一路”计划，双方签署了相关合作备忘录。此举政治含义显然远远超过经济含义。用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研究员 Lucrezia Poggetti 的话来说，意大利的加入给予“一带一路”计划以“巨大的合法性”“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

而法国则明显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尽管马克龙一再表示“关注和重视”一带一路，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具体的一步。但法国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在气候问题、维护多边主义等方面加强合作。马克龙总统也在接待中国来宾的礼仪上做出了一些超常的安排，以强调中法之间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更为“特殊”的关系。显然，中法之间的接近有一位“局外人”始终存在着：退出气候峰会并推行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的白宫主人特朗普……

更重要的是，欧洲目前正在重新定位对中国的全盘战略，试图在其内部统一认识，即中国到底是一个

“战略对手”还是“合作伙伴”。从欧盟委员会最近刚刚发布的《欧盟—中国：策略性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文件来看，似乎将中国视为某种“战略性对手”（strategic rival）的倾向已经相当明确。对此，中国似乎已经向欧盟提出质疑。

正是为了回答中国的质疑，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专程到巴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会晤。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外交举措。在一个双边峰会边缘组成一次多边峰会，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创举。但更多的专家们认为，欧盟到目前为止并未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欧洲内部对中国的认知也远未达成一致。

与欧盟的犹豫不同，中国也在2018年年底发表了对欧洲关系文件，将中欧关系定位于“没有根本战略冲突，共同点远大于分歧”。显然，对于中国而言，争取欧洲、获取法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是一步战略要棋，是对一意孤行的特朗普的一种防范性措施。将在4月9日举行的中欧峰会将会进一步将这一战略意图表达得更为清晰。显然，中国外交已经越来越走向全方位，也越来越成熟、自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果说，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的小背景是中欧关系在变化中寻求突破的话，大背景则无疑是在中美贸易战谈判的激烈交锋中探寻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对策。

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罗马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一道会见出席中意企业家委员会、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中意文化合作机制会议双方代表。

人类历史往往是在重复中循环上升，在一定的重复的基础上，走向新的平衡。今天我们都已经确认，人类社会

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已经成为我们走向明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从目前来看，对这个整体大变局的研究在西方尚未真正展开。至少我们今天还没有发现类似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指出一个新时代特征的理论出现。我们习惯于追踪西方理论的国内学术界也就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阶段。

从近年国际上发生的三件大事上，我们即可一窥中国目前对新时代的特征尚无深入研究、更遑论定论。一是英国脱欧，据透露我国的所有研究机构都未能预测到这一重大的历史变故；二是特朗普当选，这也是完全出乎中国学界“美国问题专家”们的理解范畴，坊间甚至传说有研究美国的“大佬”称“要是特朗普当选我就把脑袋砍下来”（当然，更多的人稍理性一点，说“特朗普要能当选我就不研究美国了”……）；三是特朗普在“成功”访华之后回国不久即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对华贸易战！这也是出乎很多专家的意料的；部分激进的舆论认为中美即将进入一场新的冷战；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特朗普在发动对华贸易战之际，并没有平息、甚至没有暂时平息对其邻国、对欧洲盟国、对日本等其他国家的贸易压力，给人一种“特朗普正在向全世界发动一场捍卫美国利益的全面贸易战”的印象。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或至少“正在”改变其二战以来的对外战略……

这恰恰证明，当今世界确实正在发生着一场大变局。当我们遍览西方理论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在科技、军事、金融、文化、宗教等多个领域，西方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话题上基本上闭口不谈；只在科技领域做出了一些预测，其核心在于5G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方面。问题就由此出现了，既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西方并没有认为世界正在出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变局和突破，但为什么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在近期内却出现了相当大的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和修订呢？尤其是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修订？

这是因为西方在主导世界五百年后，首次感受到了一种对其优势地位的严峻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是来得如此咄咄逼人、真切无疑：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对此感受最深、最切的，当然就是世界今天的霸主美国！美国感受到了压力，是因为美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一个庞然大物已经站到了它的身后，而且体量与它已经差距不大——或者说，差距虽然依然很大（这完全看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但却已经能够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当今世界切切实实出现了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其实是在十

多年前出现的。只是美国的选举体制导致其未能及时对这一事实做出相应的反应，结果一直等到今天的特朗普冲到了对抗这个对手的第一线时，“大变局”已经迫在眉睫。十年前的一个统计数字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 HIS 测算，2010 年世界制造业产出为 10 万亿美元。中国以占世界制造业产出 19.8% 的比例，略高于美国的 19.4%，从而成为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国家。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美国从 1895 年坐上以后，一直坐到了 2009—2010 年。美国丢失世界制造业首席位置，是美国称霸全球以来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个惊人事实。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美国一向利用种种手段，来全力压制在制造业领域逼近美国的任何国家，包括其盟国，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美国竟忽略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对它的超越呢？

美国（西方）内部正在发生“裂变”？

我相信，是因为美国和西方内部均出现了两股相对立的力量，且彼此敌视、彼此仇恨、彼此厮杀……这两股力量绝非传统的“左右翼之争”，虽然其表现形式在美国依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但其实质却是围绕着全球化、围绕着移民政策、围绕着对外贸易战略、围绕着制造业战略等一系列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执政方略而展开的争斗。正是这场围绕着反对全球化的传统产业资本与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激烈角力，导致其无暇顾及中国的迅猛发展。而等到他们之间斗出了一个特朗普，双方都暂时喘上一口气时，这才重新凸显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缩小之中这一事实，其标志就是美国失去了世界第一产业大国的位置。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才瞠目结舌地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甚至已经缩小到美国无法接受的程度。

应该承认的是，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只是表明中国在大约十年前悄悄地走到了超级大国美国的身后。中美两国关系当时显然还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强”中的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被吹上天的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此之后发生的事就比较令人吃惊了：从 2010 年迄今短短的不到十年内，中国工业制造业产值已经从超越美国走向相等于美、日、德三国的总和。中国在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 2014 年首次超越美国名列世界第一。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首任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是否就说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首先就意味

着过去人们所说的“一超多强”正在朝着“两超多强”的格局在演变？是否意味着东方在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挫折之后，终于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视了？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从强弱悬殊走向了大致平衡了？

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事实，数字统计摆在那里！如果将中国的工业产值与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相比的话，中国超出了13倍。这还不说明问题吗？但说不对，则是因为在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西方自身的分裂，是西方自身的分裂带来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相对衰退。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军事、科技、金融还是在文化领域，美国迄今为止都依然是一个真正的世界霸主；崛起中的中国与之相比，还有着相当大的弱势。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我们对自身实力的反思和自省，已经使国人有了非常清晰的认知。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超越美国、并在总体实力上迅速逼近美国，与美国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对中国的看法和对策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中国自身的巨大努力。中国华为和5G技术的突破和领先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人自身的成功，勿需赘言。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期间，西方和美国一直将其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可以产生巨大利润的机遇。在这一阶段，美国和西方的两大力量板块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对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获得西方大量投资和企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产品在哪里生产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融资本能够投资生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类投资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不仅仅是对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实际上当时对西方产业资本而言同样是利润大到无法抵御。

十几年前我曾在江南的一座小城里看到中国的一家服装大企业在生产加工美国的一条名牌裤子。令我奇怪的是，裤子上挂着两个价签：一个是256美元；另一个是“大减价：99美元”。我不懂，就问。据厂商告诉我：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定单。裤子的式样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厂商用10美元的成本制成裤子，销往美国；而美国订这批裤子是为了在大减价期间抛售准备的，所以准备了两个价签。实际销售价格就是99美元。除去运费等其他费用，美国商人可以赚大约50至70美元；而中国厂商赚……1美元，其他9美元是成本。我深感不公，问中国厂商为什么接受这样不公的条件。这位后来非常著名的中国厂商回答说：我现在不在乎利润，我在乎的是保持住这批工人，保持住我的生产能力。所以，只要不亏，

我就做。我相信将来我会制造出自己的品牌的……

事实上，今天这是一家中国的名牌服装企业。当时的美国企业对能够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大幅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大幅削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获得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从两个价签都要中国企业一并挂上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美方的利润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因此，当时美国企业向外转移、特别是向中国转移是大规模的、成批量的、难以抑制的。但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就这样一点点地消失了。

但在当时，美国还控制着“设计”环节，所以就控制着利润来源的大头。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对于美国的产业资本而言，只要能控制“设计”，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同样是有巨额利润可图的——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自身产业升级的速度竟会那么快——上述中国服装品牌今天已经大规模“入侵”过去由美欧品牌几乎独霸天下的高档服装领域……

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中国也能“设计”的时候，对于产业资本而言，不仅巨额利润迅速下降，而且由于企业转移到中国而导致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能力急剧下降，并造成美国本土就业严重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迅速形成美国的一个弱点。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苹果手机，美国《制造和科技业新闻》发行人理查德·麦克考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苹果在美国本土雇佣了2.6万名员工从事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可是却透过富士康等下游厂商在中国大陆雇佣超过70万名制造业员工。这些企业把总部设在美国，在别的地方创造工作机会，美国人也需要这些工作，但每一个制造业的工作都在中国大陆。”

而当中国自己也生产出足以与美国苹果手机竞争的华为、小米等手机时，苹果手机的优势便几乎消失殆尽。这时，虽然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服装和苹果手机在哪个国家生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它来进行投资。但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世界工厂”中国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设计能力也必然会提升。那时美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就将被挤压殆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美国产业资本外移后、或因为无法与外来廉价商品竞争而倒闭时，整个产业链上的就业就都将消失，其结果就是造成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直线上升。这正是整个西方发生的事。

开始时西方认为这是因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竞争力太强造成的，因此一致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提升劳动力成本（借口当然是“人权”……）。但问题是，中国在通过了《劳动法》之后，竞争力虽有所下降，但却

远未使西方竞争力复苏，这才最终导致西方的中下层开始在自己内部寻求答案，这就是西方极右翼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

当然，美国认定中国产业升级的成功是因为“偷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是中国实行“市场换技术”的不公平竞争等等，所以特朗普的美国才会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战中，将“知识产权”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国产业资本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180度的转弯，这就是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对策的迟疑、犹豫，就表现在特朗普与希拉里之争上。这一迟疑、犹豫的结果，就是中国迅速趁机掩身美国的身后……

必须认清美国内部分裂对我之利弊

对于美国—西方是否存在两大不同的资本：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者的利益是如何从一致走向分野的、进而使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们的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共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真正认识这一点，我们似乎还有研究视角上的空白点。

我们对中国本身的认识是非常充分、完整不缺、客观公正的；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我们对自己的国家都一清二楚。这是我们“知己”的优势。但是，在“知彼”、在对西方内部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核裂变”，我们却研究不透、甚至处于半懵懂状态。我们因此而对美国和西方内部究竟是否存在不同的两大力量板块一直存在着争议。

其实表现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存在和利益分野的现象早已层出不穷。美国之所以会在前几年爆发令人惊悚的“华尔街运动”，爆发“99%劳动者反对1%金融资本家”，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分野。产业资本的衰弱，导致的是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以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工人阶级失去他们的就业机会。在这个时候，产业资本与其雇佣的劳动阶层（即其“剥削对象”）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便在西方内部形成了以产业资本加上为他们工作的中下层劳动阶层，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两大力量板块。这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产业资本与为之雇佣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下层劳动阶层确实存在着利益共同点，尤其是在经济活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如果说，在全球化初期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利益还基本上是一致的话，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到这两大力量板块的主要矛盾：一是金融资本需要企业外移以降低生产成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而产业资本则需要企业回归本国以增加本国

中下层劳动阶层的就业。企业回归，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二是金融资本需要移民涌入、甚至不惜引入非法移民，以降低本国生产成本（非法移民成本更低），谋求最大利润；而产业资本则要堵住外来移民，将工作机会保留给本国中下层劳动阶层。封堵移民，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三是金融资本需要全球商品的完全自由流通，只有在商品完全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跨国金融资本的投资才有意义；而产业资本则需要大幅提高对外来商品征收的关税，以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四是金融资本需要各类跨国协议来强化其在各国的法律保障；特朗普的频频“退群”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产业资本要尽可能减少国际规则对其的约束力，以强化其产品输往各国的方便。而且特朗普领导的美国还需要利用美国的国内法来约束外国竞争对手。华为和孟晚舟事件说明特朗普就是这样做的。五是跨国金融资本需要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逐渐演变成为“选举民主加自由经济”的统治模式；因为只有这样，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金融和货币的直接控制，来影响和主导世界各国政权的选举产生，使之被纳入跨国金融资本能够控制的范畴。而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则没有这个需求，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便削弱这方面的开支。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已经详细介绍过，在西方选举民主国家，资本是如何通过一手控制政客、政党，一手控制媒体，来主导民主国家的选举结果的。我在西方工作的二十多年，目睹一人一票的选举是如何被一步一步通过政党、党内预选、媒体和广告的影响、控制和最终被主导的。这是西式民主的历史性衰退过程……

钱和媒体，是资本控制选举的秘方。而特朗普恰恰是通过自己手中的钱（作为大富翁，特朗普自己有钱可以支撑自己的竞选，而不像其他政客那样离不开资本）和推特（据报道，特朗普在推特等社交网络上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因此特朗普对他们的影响力远超美国媒体）、再加上美国选举体制中的“赢者通吃”的制度规定，背依产业资本和与产业资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全球化进程中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级，一举突破资本对选举的主导和控制，当选美国总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的获胜不是共和党的胜利，而是美国民粹主义革命的胜利。

而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一切，在欧洲也都在孕育之中。因此，今天的西方和美国实际上已经分裂成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两大力量板块。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与美国和西方的下一步打交道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这两大力量板块在对付中国

的问题上正在取得共识，即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主要是因为跨国金融资本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对中国的投资促使中国在开放的进程中逐步走向选举民主体制。但却落空了。因此，跨国金融资本迅速地通过其豢养的所谓“战略家”“中国问题专家”们改变腔调，唱衰中国……

对于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则对中国的体制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在科技、军事、金融和文化领域全面压制中国。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一反其他美国总统的习惯用语，可以称中国领导人为“我的朋友”，可以坦然宣称“喜欢”朝鲜领导人……

因此，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策略是不同的。前者寻求的是永远领先于中国，而后者则谋求有朝一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由此观察到，特朗普与美国金融资本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都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唯有对华战略（发动一场贸易战）得到了美国政界、资本和媒体（以及相当部分美国民众）的鼓掌！

西方是否也将踏上政治变革的门槛？

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正是缘于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利益的分野，今天在国际关系领域，各国关系、力量对比、矛盾焦点、合纵连横……都在变化之中；有的还非常剧烈。如前文所提及，意大利和法国作为同一个思想意识形态阵营里的盟国，竟出现意大利政治家跑到法国支持一心要推翻马克龙政府的“黄马甲运动”那里去，公开表示支持这场运动这样匪夷所思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法国目前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而意大利则已经完全倒向本国产业资本，成为一个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权……

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争斗，也使西方民主体制本身爆出了二战结束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内部危机。法国“黄马甲运动”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说明问题的。正是由于法国政坛先后选择了右翼总统萨科齐、左翼总统奥朗德、不左不右总统马克龙上台执政，但都没有解决法国在“光荣三十年”结束后经济衰退的总体趋势，导致大多数法国民众的生活水准近年来持续下降，法国“黄马甲运动”开始将目标直接指向统治西方的真正的三大权力核心：资本、政权和媒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马甲运动”是一场极右翼革命。其本质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被严厉镇压下去，“黄马甲运动”似亦难逃这一命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实际上转向了特朗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当选标志着“占领华尔街”运动改头换面地又回来了；“黄马甲运动”亦同样。

3月23日，在法国出动军队的情况下，“黄马甲运动”开始沉寂下来，但它一定会卷土重来。因为“黄马甲运动”恰好证明法国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党已经无法解决法国经济持续衰退的进程，证明西方民主国家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缺陷，似乎正在逼着西方民主国家对其政治体制也进行必要的改革。而马克龙总统之所以会提出全民大辩论，是因为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但马克龙是不可能提出任何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的。这就使人不得不问，法国乃至西方自身的政治体制是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事实上，法国理论界已经有人就“黄马甲运动”提出，法国应该在政治体制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民主能够继续”。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政治学教授多米尼克·卢梭就在法国左翼《解放报》论坛上发表文章，主张法国接受“黄马甲运动”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建立“公民倡导的全民公决”机制、接受或至少部分接受“抽签民主”、选出一个新的“专门由公民直接监督行政当局和国民议会的第三议会”……

这说明，西方内部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矛盾已经开始反映到政治制度层面，已经引起有关理论人员的密切关注：西方民主体制同样也已经面临“不改革将没有出路”的境地……正因为此，今天西方理论界不再讳言：中国在治理模式领域已经成为西方的“全面对手”。

四大力量板块与三大冲突

如果将英国脱欧、美国选出特朗普和中美爆发贸易战视为新时代的三件我们未曾预测到的大事件，再加上震惊世界的“新西兰枪击案”，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今天世界三大特点：一是世界正在形成西方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崛起中的中国四大力量板块；这四大力量板块纵横博弈，将决定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目前来看，西方产业资本力量板块的代表是美国的特朗普；而跨国金融资本则历来隐身幕后，我们今天只能大致看到，目前欧盟正在代表着这股无形但却又无处不在的隐形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预测美欧之间在未来几年将会产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摩擦和冲突；当然，除非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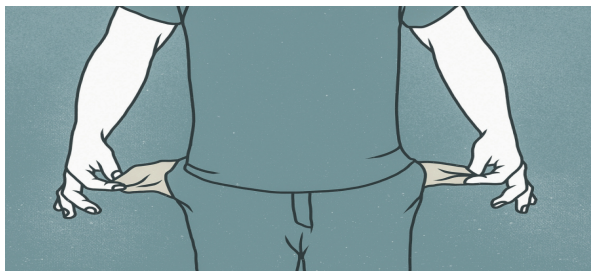
那将意味着产业资本的溃败。如果出现这一幕的话，西方整体上的衰弱将迅速成为历史现实。二是中国内部和西方内部都面临着对自身体制的调节、改善、梳理，谁能率先走出自身改革的困境，排除政治危机，消除社会危机，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谁便将会在未来的国际全方位竞争中取得先机。西方需要重思民主的实质内涵，而中国则可能需要进一步改善民主的形式本身……

（下接第5页）

个人破产制度真要来了吗？

“我曾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最近这十年，我做得很差。”这是一封信的开头，写信的人在一个项目上失败了，从此欠下三四百万元的债务，手中却只有二十几万元。“其实我想还他这二十几万，但是越还，他越觉得我还有钱，就天天催债。我现在每天东躲西藏。”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多年间他收到的这样的信还有很多。

如今，这一局面有望改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提出提案，“尽快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多次提议完善破产制度。今年2月27日，最高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表明将“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那名四处躲避追债的企业家在信中告诉李曙光：“如果有个人破产法就好了，我把这二十几万元还他，我就解放了。”



半部破产法

现行破产法仅有一部《企业破产法》，也就是说，公司可以破产，但个人不能破产。更具体地说，“在破产时，公司法人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而个人承担着无限责任”。

某地破产法庭的一名法官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是审判公司破产，如果这是一家私营企业，在审判之后，事情往往还没完。因为在经营活动中，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办理贷款时，会要求企业主个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包括提供担保，甚至要求企业主的配偶、孩子等家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该法官说，这实际上是一种“连坐”式的无限责任。这就导致在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主一旦破产将很难“东山再起”，仅仅是旧债一项，

便足以透支事主的余生。“温州皮革厂倒闭了，老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虽是段子，但极具现实意味。但是，这一状况并非无法避免。“个人工商户的破产，也曾一度写入破产法草案中。”李曙光告诉《南风窗》记者，他参与了我国破产法的起草、修订工作。

2006年，新的《企业破产法》出台。“商个人”相关的破产条文原本写在专家稿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审、二审稿中都有保留，但最终还是删去了。当时，李曙光代表专家组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这是“半部破产法”。“商个人”，即指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个人破产制度所适用的有三个对象，它是其中之一。

另外两个对象是“有固定年收入的中产阶级”和“消费者”。前者的债务关系主要是在贷款买房、投资，以及消费方面。后者的债务关系主要是在贷款买房买车，或其他大宗产品的消费上。最常见的“消费者破产”，是信用卡透支后无法偿还。由于“商个人”破产条文被删除，针对后两者的个人破产机制更无从谈起，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长久缺位，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现实中，不管法律有没有规定，个人的债权债务关系都会追究到底的。”前述破产法庭的法官说，由此，“连坐”式的无限责任这一风险链条中，破产人无法解套，企业主跑路、股市投资者跳楼，这些极端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老赖”已然无处遁形

豁免债务固然缓解了债务人的压力，但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债权人的利益如何保障？事实上，这也是破产制度在中国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从2000年至今，“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呼吁从没停止，但都被否决。

对此，相关方面的回应中，常常提到“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前提是，国家具有比较完备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

王小丽介绍，执行查封系统正在渐渐完善中，往后债务人恶意逃债、欺诈性逃债的空间将很小，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尽可免除。

但如今，在李曙光看来，在大数据时代下，个人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的可操作性，已经大幅降低，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前提已经初步具备。另一方面，推行对“老赖”的惩戒机制也更加便利。对这一点，北京顺义区法院执行一庭法官王小丽深有体会。王小丽任执行法官近十年，她告诉《南风窗》记者，她刚工作时，调查被执行人（债务人）的财产，全靠执行法官去其户籍所在地、生活住所调查。这种调查非常依赖申请人（债权人）所提供的线索，核实难度也高。而现在，执行法院内部有了一种“利器”：执行查封系统。王小丽介绍，通过这个系统，对被执行人的存款、车辆、不动产、证券、互联网银行（支付宝、微信）等财产情况，都可以很轻易地查询到。

如此，“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反而不那么重要了”。王小丽介绍，执行查封系统正在渐渐完善中，往后债务人恶意逃债、欺诈性逃债的空间将很小，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尽可免除。因此，最高法院此时将“研究建立个人破产机制”纳入规划，正当其时。何况，个人破产制度缺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日益突出。

“执行难”的形成逻辑

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导致了司法裁定，尤其是在民事案件中的执行裁定，出现了“执行难”问题。这一连锁反应的表层逻辑很好理解。因为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债务人只能被纳入执行程序，但若在被“穷尽一切措施调查之后”，发现确实是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时就叫“执行不能”。现行做法是，对“执行不能”的案件，法院以终止本次执行程序（简称终本程序）的制度，化解管理难题。

但这不能化解实际问题，还会使公众对司法体系产生失望情绪。对于处在执行一线的王小丽来说，这种困境的体验尤为深刻。她告诉《南风窗》记者，执行法官之间常会调侃：“一个走终本程序的案子，可能比一个执行完毕的案子，更辛苦。”因为走终本程序的案子，要“穷尽一切执行措施，达到规定标准”。但“标准非常严格，过程非常辛苦”，王小丽说。要通过“执行查封系统”、法官实地调查和核实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此外，在时间上也有限制。一般六个月内，仍然执行不能的，就要走终本程序。

这还没完，一旦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有了新的财产，可以立即申请恢复执行，不受时效限制。王小丽介绍，她接手了一个案子，是发生在2002年的，被执行人已经去世，但他名下的村中的宅基地即将被处理，宅基地因其产权的集体性而不能被法院执行，不过，如果被执行

人的家人成功售出，“应赔给申请人的钱款，我们肯定是会扣的”，即便这件事已经过去了17年。

同时，在“执行查封系统”内部，也会每半年滚动一次。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有了财产，也会立刻恢复执行。即便如此，王小丽仍然不被很多当事人理解，他们认为没能执行完毕的生效判决，是因执行法官的怠慢。

个人破产制度的紧迫性，就在这里显现。这项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对债务人处以破产，它也起到对于借贷关系中的一个规范作用。当个人也可以破产，借贷者必须更加全面小心地考察债务人，衡量他是否有还款能力。而不是消费贷公司、银行信用卡部门等在如今的表现，它们往往大举借贷，一旦收不回来，就推给催收公司等第三方，实行不合规的催收，再次引发社会问题。在如今未被规范的借贷市场上，由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各类借贷主体泥沙俱下，漠视风险，这才是“执行难”背后的深层问题。

一块“试金石”

个人破产制度所要发挥的功效就此明显：它要保护诚实的债务人，惩戒恶意逃债、欺诈性逃债的债务人，同时倒逼银行等放贷机构规范自己的借贷行为。不过，一个制度能否成功生效，取决于它是否被接受。以《企业破产法》为例，即便早已实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近乎“废法”。

关键在于破产案件的立案率很低。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年均立案只有1000件左右，而美国年均立案5万到8万件。要知道，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3年，每年有百万家公司陷入倒闭，破产案件的数量与之相比，显然极不相配。

同时，在文化环境、消费习惯等“软件”方面，也有明显不足。“比如，我们能否接受挽救一个破产的人”，前述破产法庭的法官说，对于个人来说，个人破产制度不是一个惩罚的概念，更多的是出于保护。但我们的文化环境“以成败论英雄”。这项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对债务人处以破产，它也起到对于借贷关系中的一个规范作用。

他以美国为例。为了给诚实的债务人以再生的机会，个人破产分两种情形：一是重整，债务人选择几年的期限，把他所欠的债务打个折扣，在期限之内全部还掉。另一种是清算，即债务人把所有的财产变卖掉，还给债权人，从此两清，剩下的都不还了。

对于后者，在破产令解除期限之前，债务人都要过一种低质量的生活。在美国，这个期限是7年。在中国香港，这个期限是5年或6年，分初次破产和再次破产。

汪涌豪： 拿什么来拯救被边缘化的经典阅读？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但与此同时精神空间却被收窄了，加上知识的泛滥和网络的挤占，种种原因造成经典阅读的重要性不再为人所共同认知。尤其是近几年来，各种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阅读持续走低。

阅读从来就不是“悦读”

之前有过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一年看不到五本书。为什么？许多人回答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但是，我们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看盗墓、穿越等类型的小说的。当然，不一定读纸质书，大多是在手机上看。雅斯贝尔斯曾经感叹：“人们草草阅读，只知道追求简短的、能快速获得知识的、又很快速遗忘的那些讯息，而不能去读那些能引起反思的东西。”



在破产令解除前，当事人的生活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最明显的是在消费上，当事人被规定以一定的生活费，只保证基本生活，比如锅碗瓢盆留下，生存需要的收入留下，收入的其他部分都用于还债，直到破产期限结束为止。当事人也会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情形严重者配以“黑名单制度”。

国外有专业机构对此监督，限制当事人的出行、旅游，以及进入一些高消费场所，比如酒吧、夜总会，和高级酒店等。此外，在破产令解除前的这段时间内，当事人还会被剥夺、限制和减少“个人的私权”，比如禁止创业，限制参与经营性活动，不能开公司，不能担任公共职务。通过对这部分权利的剥夺，作为交换，实现对当事人的“债务豁免”。

但文化环境并不是主要障碍。李曙光说，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中观察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可以发现只要将制度设计合理、详细，适应本地实际，推行起来并无大碍。所以，关键在于是否有完备的“顶层设计”，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

仍以《企业破产法》为例。李曙光介绍，原本在中国并没有破产概念，但转入商品经济时，突然发现“国有企业的亏损很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就提出引进破产制度。为拯救亏损严重、但仍有价值的国有企业，2006年新的《企业破产法》实施，又引进“破产重组”制度。

《企业破产法》并不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由此产生出一些问题。破产法专家齐励杰在《破产重整制度的比较研究—英美视野与中国图景》一书中认为，中国的企业破产重整制度中，不同于英美，在股东组权益和债权人组权益之间，它更倾向于前者。另外，在企业破产司法实践中，非常依赖“政府—法院联动机制”。

这些问题，在即将建立的个人破产制度中也会继续存在。或可说，个人破产制度在推行中是否有效，是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度的一块“试金石”。

（2019年6期 南风窗）

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上海有一个作家叫王安忆，她曾经跟朋友说起过，自己年轻时读书是一件如何奢侈的事情，因为书不易得，甚至常常没书可读。这个我也深有体会，我小学那会儿，连报纸都很少，《解放日报》《文汇报》也只有四个版，我把中缝都要看了。当然这个中缝不是广告，当时还没有广告，有些正版的文字登不完，就放在中缝。在当时来说，读书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但让王安忆感叹的是，想不到时至今日，读书居然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现在大家喜欢手机阅读，手机上大多是些轻短的小文章。有人告诉我，他在手机上只能忍受滑拉四下就读完的文章，再多拉一下就没兴趣了，深刻的就更看不下去了。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侧面反映出经典阅读越来越被边缘化，其意义与价值越来越不被人认知的事实。当然，我无意于否认知识可以多渠道获取。难道网络就不能获得很好的资讯吗？当然不是。我在这里只是想让大家注意，媒介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淹夺了阅读的本意。现在需要重新确立一直以来我们所坚持的阅读方式。

我想，生活中，人们不会认为开车可以完全代替走路，因为欣赏好的风景有时候是非得走路不可的。读书也一样，直接面对书本更好。还有，现在有些书店弄得很时髦，添了咖啡吧，又增益出许多文创产品。卖文创的柜台越来越多，卖书的柜台反而被挤到了边缘。而且卖的书也多是些时髦的励志书、旅行书。书店搞得越来越时尚，真正严肃的书却被挤压掉了，这有意思吗？但是，眼下这个东西就是吸引人，因为这是一个包装的时代，人们并不看重你的成色是多少，重视的只是包装。所以媒介的变化，包括书店的变化，已经淹夺了阅读的本意，只是许多人对这种变化不以为意。

所以我们要强调，有些深刻的道理，必须通过艰苦的阅读去获得，且只能是书面阅读。但是现在许多人希望阅读能给自己带来轻松的体验，甚至把阅读改成“悦读”，这是不恰当的。事实上，阅读是一件乏味的甚至艰苦的事情。你只有捅破这个乏味、艰苦的表层，进入到它的内里，才能感觉到一个无穷的世界在等着你，这个时候，你才会渐渐地喜欢上它。而在此之前，要人真的喜欢上它是不容易的。你不要告诉我自己天生就喜欢读书，读书是需要训练的，特别是阅读经典更需要训练。它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一定吸引你，但一旦读进去了，你才会被深深吸引。所以，期待阅读成为“悦读”，特别是指望经典阅读能变得轻松惬意，是不现实的。

今天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有些人不读书了，喜欢读画读绘本，乃或以看电视代替阅读。其实，画面有一个

具象，能刺激人的感官，但感官被外在的具象吸引后，对象内在的呈现不免会受影响。感官被刺激多了以后，心灵的调动通常就不能充分，时间久了，很容易产生思维的惰性，形成被动接受的依赖，进而造成迟钝和自闭，造成与社会、与他人的沟通不良，严重的连生存都会发生问题。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虚拟世界里浸泡久了，就会失去对这个世界正常的感知。这样的事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有人也许会问，我拿电子书读《呼啸山庄》，图个方便轻巧，和读厚而重的纸本《呼啸山庄》，能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强调读纸本，目的是接续和恢复阅读的原初状态，赋予阅读以一种庄严的仪式感。特别是当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开始步入阅读殿堂的时候，尤其需要有这样一种仪式感。所以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才说，“当人们学习的时候是在学习一种行为，读书阅读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行为，不是你天生就会的、一蹴而就的。”

至于网络，因为它经常提供即时性、碎片化的资讯，更容易影响人的阅读品质。这个话不是我说的。科技杂志《连线》的创始主编，也是世界第一届黑客大会的发起者尼古拉斯·卡尔，前几年写过一本书，叫《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我们的大脑》，他在这本书中详细探讨了网络如何对人的神经线路甚至记忆程序进行破坏，如何经过一种重新编排，使得人们本来希望深潜到对象的底里去探究最深在的根源都变成了只会流于字表的滑行，而那种持续性的深入的思考，似乎离人类越来越远。当我们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不知道这个虚拟世界的界限与区别时，你想提升你的文化是没有可能的。尼古拉斯·卡尔把这样的人称为“屏幕之民”，即这种人高度依赖电子屏，只会“屏读”，不是一个会思想的人。遗憾的是，当今世界，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有人戏称美国人宁可不开车也要上网，法国人宁可不洗澡也要上网，中国人宁可不要生活也要上网。这是一件很值得警惕的事情。

看看我们的周遭，已经有太多人不再习惯思考了，他们只想着去找现成的答案，动不动就百度一下，就像柏拉图《费德鲁斯篇》所指斥的，因“灵魂上的健忘”，而只会“依赖外部书写符号”，不知道人只有通过经典的阅读，才能养成智慧的头脑，以及由这种头脑再分析、整理，形成自己的知识记忆。信息没有经过分析和整理，不能形成知识；知识没有加以主观的批判，不能形成思想。而缺少了艰苦的阅读，基于经过整理的信息和经过批判的知识基础上的思想，恰恰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短

板。

读经典绝对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抽象命题

接下来谈谈什么叫经典。关于经典，大家耳熟能详。对此，南非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切在《何为经典》中是这样定义的，他称“那些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就是经典”。当然，撇开库切讲这个话的具体语境，那些历经人们最诚挚的颂扬而得以流传百代的，当然也是经典。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不能仅将经典局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上。大家一说到读经典，似乎就是读《艰难时世》《老古玩店》《巴黎圣母院》，不是这样的。从《论语》到《日知录》，从《理想国》到《存在与时间》，许多人文社科类的著作，乃至一部分自然科学著作，同样是我们必须读的经典。

经典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对人的处境有真切的关心，这个人既指单数意义上的人，同时也指复数的人类，也就是能关注人类整体性的精神出路问题。其次，是对人的命运有深刻的体察。第三是对人的内心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谅与同情。

刚才我们提到了读人文经典。那人文是什么？人文就是处理人的日常世界和价值世界关系的学问。好的人文社科类著作因为关心人的处境、理解人的命运、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感同身受的体谅与同情，都应该成为我们阅读的范围。康德曾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难道康德的意思是说你跟我一起去看流星雨吗？不是这样的，恰恰是说你舍弃小我，抬头关心人类整体性的精神出路问题。

古希腊的泰勒斯因为被许多问题困扰，走路时抬头看天，一不小心掉到了沟里。他的仆人就笑话他连路都不会走，还关心这么多事情干什么。后来康德就说了，一个永远躺在沟里的人当然会笑话她的主人，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爬起来过。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人，为了探索伟大的真理不小心跌倒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基于这样的事实，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作为知识之王的哲学经典，尤其应该被大家所重视。一个没有读过哲学的人，很容易沦为一个事务主义者，很容易沦为一个婆婆妈妈的人。因为哲学是以小搏大的，它不一定关注细节。所有的细节在它这儿都熔炼成了它言说的背景，而它想告诉你的只是真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康德、黑格尔与自己无关。你去读读《纯粹理性批判》和《历史哲学》，其实说的都是平实的道理，有时语言也不失形象风趣，经常打生活当中的比方。当然，书中

会有一些作者创造的特殊范畴，这些在哲学辞典都查得到，只要掌握了他们思想的主调，借助一些参考书，每个人就可以较顺利地把它看完。哲学是最好的知识训练和思维训练，所以古希腊人用“爱智慧”来界定它。

进而，我们还想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比科学更伟大。科学主要是求答案，而哲学主要是问问题。我们今天说做学问，有人说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学，一部分是问，其实所谓学问就是学会问问题。科学家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终结了一个问题，哲学家之所以更了不起，是因为他们不断地把终极性的问题放在你的面前。

倘若仅崇拜纯知识本身，你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知道分子”，而你对知识本身有质疑、能提问，你才是知识分子。“知道分子”跟“知识分子”一字之差，区别就在于你能不能作哲学思考，从而颠覆性地提出问题。而因为你的问题，可能一门新的学科得以产生，一个新的领域就此向人敞开。

再回到我们最熟知的艺术经典与人文经典，两者虽然都指向世界的本质和人性的根本，但是人文经典有的时候比艺术的经典更重要。尽管大家都觉得文学有故事，重视抒情，更能体现个体的生命，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但是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后面都有深刻的思想，乃至于这些文学家本身就是哲学家。所以，如何通过阅读文学，更重要的是阅读人文社科类著作，获得对真理的深刻领悟，对知识的解构非常重要。如果只有故事，没有太多深刻的东西，这就不足以打动人，更不易服人。总之，所有的经典都指引人找到自己的路，所以读经典绝对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抽象命题。

不要去读那些爆红的大众书

明白了上面两点，才可以谈经典阅读的意义和价值。经典阅读当然全然不同于我上面讲的“悦读”或“浅阅读”，因为它有对人类普遍性和本源性问题的热切关注，可以帮助人了解世界，关照自我，扎扎实实地给人提供高层次的精神养料。

首先，经典阅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也就是说经典提供的经验，可以让人们找得到世界的原始图景。经典有各种不同的个性化形式，但都可以将人引向这种原始的图景。只有认识了人类的原始图景，我们才可以明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从而认知未来，发展无穷。

有人说，我们不能更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美，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精力，或者没钱，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受到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没有获得了解世界的能力与方法。而经典阅读能帮助我

们确立这种能力和方法，所以它才被人称为“心灵的探险”或“灵魂的壮游”。

现在大家条件都好了，出国旅游不是一件难事。比如想去伦敦，办好签证，买一张机票就可以走了。但我想问的是，你只能去当下的伦敦，你能去历史上的伦敦吗？如果要去历史上的伦敦，是不是只有通过阅读？也许有人要说，难道从生活当中了解不了世界吗？这个话当然没错，但是对于经典阅读来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生活并不必然就比虚构的经典有更多的真实，世界也并不必然就比人们的心智创造更能体现这个世界的本质。由媒体、网络建构出来的生活世界，有的时候尽管都存在，但常常只是人生之表象，它们的浮泛、零碎，根本不足以映像这个世界的本质。如果没有经典的烛照和指引，它们完全可能被人表现得毫无真实感可言。

所以，法国作家尤瑟纳尔说，“人真正的出生地是用智慧视野关注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书籍，所以我的第一个出生地就是书本”。以色列是个小国，但是这个国家令人不敢小觑，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那里，小孩一出生，父母就会领到两张卡，一张出生卡，一张读书卡。难道婴儿能读书吗？不是的。先发给父母，是告诉他们，你的孩子一出生，命定必须阅读，而作为父母，你们必须教会他阅读。以色列人墓地的形状和装饰几乎都是书，他们甚至把书橱放在卧室里。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有书橱，但很多时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其次，是能帮助人关照自我。人生有限，决定了人有使命需要完成，这个使命既对自己的家人，更是对自己；如果你有出息的话，还包括对国家与民族。而要做到这点，了解自己是首要的。但是，实际的情形是什么？人恰恰最难做到了解自己。有些人遭遇倒霉、挫折、屈辱，喜欢怪别人，但其实大多数时候，这些都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说到底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所以，古希腊德尔菲的神庙上刻有这样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中国的老子也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者明”或“认识你自己”，是一道横亘在东西方人面前千古的命题，而经典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帮助人了解自己，帮助人判别什么是假真，什么是伪善，从而既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也能够原谅别人的不足。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什么人是为了读书而读书的，人们通过读书，只是读到自己，只是在书中检查自己、发现自己。

“悦读”或“浅阅读”显然不可能达成这个目的，而且还会把人引向滥读。叔本华曾经谈到过滥读问题，认为因为滥读，造成了许多杰出的头脑离开了人的身体。所以，他提醒人“不要去读那些爆红的大众书，不管是

政治、宗教、诗集、小说”，他说凡是为傻瓜写作的，总会有一大群读者。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书读的人越多，就越能够辨别它的成色。“只有具有伟大心灵作者的作品，才特别值得你去倾听。”

在这里，我特别想引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这部书当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经典不是我读过的东西，而是我正在读的东西”。这说明一部经典可以反复读。他又说：“每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样，是一次发现的航程”，这个“发现”既指发现客观世界，更指发觉主观内心。他说“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容易将时下的兴趣降格为一种背景的噪音。”什么意思？你读经典，一旦读进去，外部世界流行物的地位就下降了，仅仅成为一种不值得倾听的噪音。而我们现在恰恰是被外部世界牵扯了太多的精力，包括我们对自己未来人生之路的设定，也不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而是遵从了外部世界的命令。这有点可悲！

最后谈谈经典阅读的方法，其实是原则。其一是要在观念上去除功利的考较，使阅读真正成为“自由阅读”。为什么要去除功利的考较？因为经典作品具有无与伦比的精深博大，它可以助人涵养精神，拓展心胸，甚至可以帮助你获得职场上的成功。牛津大学的社会学家经过20年的调查，确认阅读对人的职业水平的影响远远超过喜欢电影、音乐和社交，但这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出于爱好读书，这样读的时候，人的身体就会释放出一种使你快乐的多巴胺，让你更自觉地投身其中。

古人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个东西使你感兴趣，学起来就会特别带劲。但是遗憾的是，“古之学者为己”，古代好学的人是为了自己精神的成长而学。“今之学者为人”，今天许多人读书只是为了符合别人的愿望，从生活中换回一些东西，比如学位、晋级。须知读书不能总讲有用没有用，这个世界有许多事，不是有用和没用可以一言道断的，有的书离现实很远，你可以说读了没用；但它离你的理想与情趣很近，它们真没用吗？不是吧。如果各位想就此作进一步的思考，建议读读法国作家夏尔·丹齐格的《为什么读书》。

其二是要克服求快心理，要静下心来慢阅读，这里的慢不仅指时间，更指心态，这样才能造就一种“品质阅读”。有人说，慢了会读不完。其实不要有这种担心。在这里，我向各位介绍美国人费迪曼写的一本书《一生的读书计划》，书中列出一个人18-80岁必须读的一百种经典作品。可见，人的一生，大体是可以读完最重要的经典之作的。再说，读不完也没有关系呀，因为从读

(下接第7页)